

在信仰的旗帜下

——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暨中共琼崖地方组织成立90周年特别报道



第十七期

陈日光、陈斯安



琼中吊罗山乡新安村，原牙防村，是陈日光父子带领苗民追随共产党、坚持革命斗争的地方。
本报记者 陈元才 实习生 陈若龙 摄

为解同胞苦难，“苗王”陈日光率领族人坚持革命斗争，与儿子陈斯安一起献出宝贵生命 苗族英雄父子舍身取大义

■ 本报记者 苏庆明 周晓梦 通讯员 秦海灵

队长。

上山坚持革命斗争

位于保亭、白沙、陵水等几县交界的吊罗山，是海南连通东部和西部的必经之地。国民党势力、日本侵略者的势力都向这里渗透。据琼中党史县志办副主任叶传雄介绍，当年海南革命进入低潮，为坚持斗争，陈日光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带领苗民把牙防村移到了吊罗山上；陈明京也介绍说，那时陈日光本人为躲避敌人视线，建造假坟茔，佯装病故。

望着高耸的山脉，在新安村，陈日光依然健在的小儿子、86岁的陈斯太仿佛又回到山上度日的艰难时期。“没地住，没路去，没盐吃，当时的日子难过啊，但又不能下山。”老人回忆说，由于山高气温低，一般庄稼作物难以种植，水稻种出来的都是空壳稻，所以木薯野菜成了村民填肚子的主要食物。

“这就是他们在山上吃的。”陈明京向记者展示了两种野菜，一种是苗族人所称的“菜叶”，也叫水韭菜；一种是铁芥菜，苗族也叫山兰菜，样子像青菜，但比青菜要小。“水韭菜随便一撒就能长，摘了马上又生；铁芥菜长成后，200天都不会死。”陈明京说，正是这些高山野菜，支撑了陈日光、陈斯安等人的斗争。

在1940年初期，由于反动势力逼迫加剧，陈日光率领苗胞在吊罗山和其他地方之间来回辗转。1942年8月，他带着家人和10多户苗胞迁居五指山南麓的什阶村，1943年夏天带领全家又逃回吊罗山上。艰难的形势下，他还带领全家先后跑到陵水、万宁的占区，又因不愿过亡国奴生活，3个月后再次返回吊罗山。当年秋，国民党制造中平惨案后，吊罗山周边虎口余生的苗族同胞纷纷投奔陈日光。

随着琼崖抗日斗争形势高涨，为配合我军挺进五指山建立中心革命根据地，1944年秋，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指示第三支队派周海东去联络“苗王”陈日光。因为道路险峻，他费

了好大功夫才上了山。

由于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，牙防村戒备森严，陈日光也有着很高的警惕性，他不知对方的底细，一时不肯现“真身”，派儿子陈斯德、陈斯安兄弟接洽周海东。周海东耐心地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革命道理，终于打动了陈日光。在他的指导下，陈日光成立了吊罗山苗民抗日后备大队，次子陈斯安任大队长。陈日光在后备队成立大会上，含泪握着周海东的手激动地说：“我一辈子敬神，但神并没有帮助我们苗民。今天，共产党指导我们成立苗民武装，我们一定好好跟着共产党干！”

陈斯安任大队长后，经常带领队员下山送情报、当向导、送粮食、接送伤病员，使吊罗山很快成为琼崖共产党和军队的联络所、情报站和疗伤处。“有一些人常常回来出我家，和我爸爸、哥说事情，我那时候小，也不知道他们做什么。”陈斯太回忆，当时他并不知道父亲和兄长为何总是神秘兮兮，后来才明白他们“是在为共产党做事”。

1946年5月15日，国民党四十六军300余人偷袭吊罗山，陈日光与23名苗族同胞被捕，关押到陵水一处原日寇所建的油库中。国民党当局要陈日光“自杀”，陈日光反问：“我跟共产党打日本鬼子、叛国贼有什么错？我的同胞有什么罪？”

国民党当局要陈日光交出次子陈斯安，以换回苗族同胞。陈日光明知儿子一来父子必然被害，但为了救出无辜同胞，毅然致书：“愿我父子同死，救出众乡亲。”

狱中，父子两人忍受酷刑折磨，坚贞不屈。随后，敌人将他们押至保亭县城，于1946年12月31日将父子俩杀害于保城河边。

“敌人杀害他们后还发出布告，不准苗民收尸，所以他们的尸体被水冲走，尸骨无存。后来苗族群众为纪念他们，就按照民族风俗，把他们后人的毛发，指甲安置在坟墓里。”叶传雄说。

而至今，陈斯太还记得父亲的形象，“他当年有一匹白马，是琼崖纵队第三支队送给他的。他骑在马上，威风凛凛。”

(本报营根7月3日电)

H 老区新貌

琼中新安村： 编制“村史” 传承红色精神

■ 本报记者 周晓梦 苏庆明
通讯员 秦海灵

村子搬了又搬，是新安村民都知道的故事。

在吊罗山脚下的这个村子，就是陈日光、陈斯安生前战斗过的牙防村。山路曲绕，然而当年牙防村的村民们却无处可逃：抗日战争时期，国民党顽固派和日军的触角向这里延伸。

就是在这样的恐惧不安笼罩下，村民们跟着陈日光父子，把村子搬到山上。直到1953年，他们才得以重建新的“牙防村”。

“1952年11月，县人民政府决定动员苗族群众下山定居，发展生产。1953年牙防村分散居住的村民迁住大平坡，被命名为新安村，意为‘新居乐业、和谐平安’。”新安村村民陈明京说。村民们从此以后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
走过曲绕山路，大片翠绿茂盛的桑树、槟榔、益智等成为新的风景。据吊罗山乡新安村党支部书记邓运新介绍，现在新安村的总人口有600多人，村民们大部分都种植南药、种桑养蚕、养蜂等，靠双手勤劳致富。虽然，老村旧址在海拔900多米的山上，但每年新安村都会组织村民上山，回去纪念缅怀先烈。邓运新说，目前村委会正在整理编制《新安村大事记》资料，希望历史能一代代传承下去。

村子周围的槟榔林随风摇曳，太平河的河水从村南侧缓缓流过，老人坐在自家的小洋楼前，一边等着孩子们放学，一边和邻居聊着过往……曾被敌军逼上吊罗山辗转流离的村民，曾让陈日光牵挂的村民，如今已在这青山脚下辛勤耕作、安家落户。

(本报营根7月3日电)

核心提示

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城出发，一路向东南，穿过盘曲山路，就到了态势巍峨的吊罗山山区。吊罗山乡新安村，就在山脚下。

与多年前一样，如今的吊罗山依然陡峻险阻，令人胆怯。但新安村的苗族村民们，每年都坚持组织上山一次，缅怀英雄先人。在海拔超过900米的吊罗山上，伴着吐露芬芳的兰花，海南革命烈士、苗族英雄父子陈日光、陈斯安的墓碑并肩而立。

新安村是解放后才迁移下来的，原名叫牙防村，是陈日光父子带领苗族群众追随共产党、坚持革命斗争的地方。

“我一辈子敬神，但神并没有帮助我们苗民。今天，共产党指导我们成立苗民武装，我们一定好好跟着共产党干。”时隔半个多世纪，这对父子英烈的话语依然久久回荡。



陈日光、陈斯安烈士墓。

本报记者 陈元才
实习生 陈若龙 摄

为救同胞苦寻信仰

“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！”看着历经沧桑的烈士墓，60岁的新安村村民陈明京满怀深情。

陈明京是曾与陈日光一起闹革命的同族兄弟陈日钦的儿子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全程参与了两位烈士墓地的修筑，对吊罗山一带革命事迹也做过调查研究。在槟榔掩映的新安村，他向记者谈起，出生于1883年的陈日光原先是苗族群众的首领，也就是当地的“苗王”。他不仅身材魁梧，体力超人，而且聪明好学，从小就能读能背世世代代相传的盘皇经书和歌谣。

村中有老人曾回忆：“我们苗族同胞住在山上，经常吃不饱饭，生病更没有药医，过得很难。陈日光面对这种情况，也没有其他办法，只能寄希望于某个神灵来解救大家。”

1913年，陈日光在抓捕一头熊时落下了眼疾。他到琼海嘉积基督教教会医院把眼治好的同时，也被西方医学技术震撼，并接受基督教教义，成为海南苗族同胞中第一个基督教徒。陈明京说，回到琼中南茂村后，陈日光带领苗族群众信教，到1919年，南茂已成为苗族信教的中心。

据陈明京考察，当时“南茂村一带，土地越种越瘦，年年闹饥荒”，陈日光觉得上帝并不能解除同胞的疾苦，于是脱离基督教。1922年，他带领家人迁居吊罗山北麓的太平乡牙防苗村，“刀耕火种，伐木为园，苦度荒年”。

1927年，吊罗山的另一边，陵水成立苏维埃政府，第二年共产党人在吊罗山区成立太平乡苏维埃政府。陈日光开始认识到，只有跟着共产党，苗族人民才有出路。陈日光与族人同饮鸡血酒，“发誓要干革命”。他积极发动苗族群众参加革命，自己被选为乡苏维埃政府委员。

根据陈明京的调查，1927年秋到1928年秋，陈日光带领苗族群众，3次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。后人提及，1929年8月，他带领同胞伏击前来掳掠的国民党陵水县中队，击毙了中

英勇就义视死如归

随着琼崖抗日斗争形势高涨，为配合我军挺进五指山建立中心革命根据地，1944年秋，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指示第三支队派周海东去联络“苗王”陈日光。因为道路险峻，他费

自己的生命
最终献出了
忍受酷刑折磨，
始终坚贞不屈，
他与儿子陈斯安
毅然投身革命，
为了救出乡亲，
带着族人
同袍们的苦难，
并不能解除
但神仙上帝
第一个
苗族同胞中
海南
当地的“苗王”，
后来又成为
也是
就是
的首领，
原是苗族群众
陈日光